

До и во время

此前与此刻

Владимир Шаров

〔俄〕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著

陈松岩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До и во время

此前与此刻

Владимир Шаров

〔俄〕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著

陈松岩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8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前与此刻 /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著; 陈松岩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301-27726-3

I. ①此… II. ①弗…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5494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书 名	此前与此刻 CIQIAN YU CIKE
著作责任者	〔俄〕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著 陈松岩 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朱房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726-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hufangxu@yeah.net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8.25印张 248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精装)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1

我第一次出现在这家医院是在1965年10月，似乎是在18日。当时本不该让我住院，我是说，我想让曾在门诊工作过的克隆菲尔德教授私下提个意见，给我挑选出适合我全套病症的药片。我出了地铁，跟往常一样，斜着穿过一片空地和没有围起来的建筑工地。这里已有很多人走过，所以昨夜下的雪已经被踏得实实在在的，有些地方甚至压得结成了冰。那景象完全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刚过去一个个地基坑和高矮不齐的水泥板跺，便是各种仓库、车库、蔬菜库，不远处是曾经通航的亚乌扎河，这里还有一条铁路经过，并且所有一切都同原来一样连成了一片。

我心里知道如果走斜线需要走上20—25分钟，可我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该去的街道还没见着。脚下的小道又窄又滑，理所当然，我走得要比平常慢一些，但不管怎样也该到时候了，早该到了头了。我给自己设定了期限，预备好了走路时时刻要顾忌别摔跤，要像马戏小丑那样用胳膊找平衡。可这一期限已经过了，我累了，生起气来，气我没有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要更平坦。本来可以不穿过这些仓库和工地，而沿着两条宽阔的街道绕过去，那些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走起来没危险。我确信我迷了路，我用最难听的话骂自己，几乎要哭了。当时病情未必到了那种严重程度，但我还是去了，去看医生，去精神病院，也不知道医生最后会说什么，会怎样决定我的命运。我当然会焦躁不安，并且懊恼出门就走，现在已经不可能走一条虽然长但很安全的路

了，我走了一条既不平坦又是错误的路线。

总归还是有上帝保佑。当我还在车库间绕来绕去，尽力躲避坑坑泥水时，脚下的泥土，我走的路，还有这未完工程的迷宫，甚至是积雪，突然全都一起散发出香草和新鲜烘烤的气味。就在前面有一个面包房，人家和我说它是个路标，它和医院在同一条街上，从它再往前第三座楼就是医院。

香草的味道是我童年的味道，我就是在这个味道的氛围中成胎、被孕育和出生的，我的母亲、祖母，还有我们的房子，一句话，我生命中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散发着这种气味。我生命的头六年住在真理大街，离此不远是至今仍以茨冈人而闻名的苏维埃旅馆，其对面是规模巨大的布尔什维克糖果厂，香草的气味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所以我在记忆中总是坚信，糖果厂起这样一个骄傲的名字，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的人——软绵绵的、胖乎乎的、甜丝丝的。

我的母亲极其喜爱巧克力。她手指纤长，指甲涂成紫罗兰色，并且当她和为数众多的女友中的某位喝咖啡时，她常会从花花绿绿的盒子中拿出大大小小菱形和宝塔形的巧克力糖果，这真是太美了。我三岁时得知，出产这些成盒糖果的工厂叫做布尔什维克，这就彻底确立了我对布尔什维克（不管他们是男是女）的认识。甚至如果有必要，可以说这解决了我童年时一个如此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哪儿来的，怎样出生的。世界图景被完美建立起来。

大家知道，童年最初的印象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牢固。大学毕业后，我实质上已经是个成年人，一个相当有经验的记者，每次一要我写布尔什维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写得柔软温和，然后再花很长时间痛苦地改来改去，并且不管怎样做，我都

得不出他们应有的样子。这丝毫不足为奇：我依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且似乎要永远留在那个世界。就怪这些布尔什维克，我们报社的人认为我好像是个小傻瓜，尽管他们也许对我还挺好。我写的报导想原封不动拿出来当然不行，可是其中毕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主人公都是满怀真爱和温情写出来的，就连报社的老手都说他们羡慕我的真诚。很遗憾，一旦有人想试图更正文字，这份真诚立刻化为乌有。

我明白这样长久下去是不行的，让某个人实际上顶替我工作这不公道，所以大约过了两年我辞了职。走这一步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喜欢和报社相关的一切，喜欢它的精神灵魂，并且从实质上说我也无处可去。当时我积攒下了巨大数量的报导和小说没有刊载，所以我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四处打打短工，挣点外快，慢条斯理，随波逐流，去寻找能满足我生活观的出版社。最终我在本该找到的地方找到了，我找到了，和我的布尔什维克们一起回到了童年，回到他们还有我出生的地方。

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从一些地方愿意登载我的作品开始（比许多我报社的熟人都愿意），有《少先队真理报》，有《穆尔齐尔卡》，有《营火》，特别是小朋友出版社。我写的是那些在家里、在托儿所、在幼儿园里读给孩子们的最初的书，因为里面有我自己的童年、善良、温柔，因为我写的布尔什维克像妈妈，善良、和蔼的妈妈，所以孩子们当然会喜爱他们，愿意一遍又一遍倾听这些故事。然后和所有人一样，我的读者渐渐长大，认识世界，明白共产党员们并不总是善良温和，但是对他们的爱会保留下来。总的说来，我没什么可难为情的，我诚实地写了我所想的，尽管现在看起来，我的小说可能有些天真幼稚。

写列宁的几本书最终让我成了名，并且在整个这个事件发生

前我一下子得到两个特别诱人的建议，两个我以前想都不想不到的建议。多年以前我上大学时，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塔尔夫人的，后来接着收集有关她的材料，甚至曾经拿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给出版名人生平系列传记的编辑部，申请写关于她的书。很自然这一尝试没有结果。而如今当我已经忘记了出版申请这回事时，已经整整过了一个月（我刚开始着手写斯塔尔夫人），政治出版社建议我成为联盟另一个畅销系列“热情革命家”的作者，而且声称我的名誉如此清白，连人物和时代都任凭我来选择。不过，拿破仑式的宏伟蓝图我过去没有，最近三年也没有写过一页，只是靠着再版旧书的稿酬糊口。



医院占地面积相当大，各种建筑风格、各式各样又一律色彩灰暗的建筑，毫无章法地围绕在一个巨大的中央花坛周围。此时正值秋末时分，花坛布满斑秃的枯草，草上洒满积雪和残落花簇。我去的那座楼是近些年建成的预制板组装建筑，正对着大门。我一走上需要去的七楼，就确信下来我是准时到了。但我先前白白着急了。克隆菲尔德正忙着，他查房时被部里的调查组给耽搁住了，并且护士转告我他至少一个小时后才能给我看。之后通往诊室的门锁上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狭小的、几乎像个凉台的地方，亮堂堂的，不知是走廊，还是准备室。

我在这里好像有点像进了个陷阱，既不能按电梯，也不能走楼梯下楼。走廊的窗户朝向亚乌扎河，这里河道极其窄，沿岸

高大的石头墙几乎挡住我看见河水。墙上面不久前又加上了积雪形成的堤坝。从那里，从下面伸出浮吊杆，仿佛农村水井的取水杆。我站着看浮吊，一直想它眼瞅着就要弯下来了或者扭个方向，可就是没有等到。

我今年45岁，但是3年前我在汽车站附近结的冰上滑到了，颅骨受了损伤，那之后开始记忆衰退，一年有两三次出了家回不来门。当家人为了找我走遍停尸房、守候在民警局问讯处时，他们常被告知他们未必有一天还会见到活着的我，可是之后过几个星期，有时几个月，我被找到了：或者是因四处流浪没有证件而被捕，并且当然也没有钱，在某个离家不近的预押室，不知为什么最常见的是在南方（我从小就向往南方，向往大海，这不容置疑），或者是在某个地方上的精神病诊所。通常会被暴打，浑身伤痕血瘀，有时是被民警，有时是被护理员（据说我在这种处境下很不安分，甚至有时很狂暴），有时是被同行的陌生人（我真想哪怕有一次此时旁观一下我是个什么样子）。之后会在家病很久，但最终还是会离家出走；我天生是个结实的人，并且甚至记忆会逐渐恢复，尽管起初无法叫出自己的名字以及姓氏。

总的来说，一切暂时会逐渐恢复，所以对这我不觉得沉重，也不觉得痛苦，我很容易做到，很容易，就像倒线绳一样。我看到母亲和姨妈非常喜欢和我一起回忆往事，并且感到自己又成了孩子。当孩子重病后康复，全家人都为他高兴，简直是兴高采烈地看到他在恢复健康。但我的前景很糟糕，据医生们讲，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会被罪犯打死，还有一些被弄残，残得已经无法让他们站起来，还有人（民警不喜欢管我们）一年和一年以上都找不着；而最重要的，每一次病情重新发作后，我的记忆就会恢复得越来越慢，越来越艰难，最后面临彻底失忆的危险。说实话，

也就是对这一点的恐惧才把我带来见克隆菲尔德。

我现在旁边走来走去的那扇门后面的病房科里正在试验一种药，能够（听起来简直太神奇了）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而我的病恰好是与此有关，受伤后许多血管受损，血液不流通。这种新药是给我的一个机会，我明白这一点。可我还是对查房这一小时或一小时多一点感到很难受。我被忘在准备室里的时间不算长，而且那里也不那么可怕：电梯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玻璃门外总是有人影闪动，本可以招呼他们，叫过来，请他们把门打开，甚至至少可以喊叫起来，那医生也就会中断查房赶过来。一切都有可能，也有无穷无尽的各种出路，但我最近几个月被折腾得已经没了力气。

最初一两年我尚能坚持，甚至还能以自嘲对待病情，我要嘴皮子，说失去记忆后我被净化了：各种垃圾、令人厌恶的东西都会离开，我又像婴儿一样纯洁无辜。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此外，病症暂时能过得去，比别人轻很多；因为记忆很快能够恢复，智力没有丝毫损失。也许是母亲每天喂我的一大堆维生素救的命，不管怎么说，我思考能力显然不比以前差。一句话，摔倒后很长时间什么都可以忍受，而后来突然一下子我感到累了。我开始期待起新的发作，开始捕捉它，越来越害怕它，有几个月时间就让自己达到发病程度。医生们认为，我不能过度疲劳，我现在一切都听医生的，限制自己，总是观察有什么不对头。这让我受不了，我没力气做到，我突然明白了，我老了。

但我还在坚持，直到身边一下子有几个我亲近的人去世，而且他们死得那样孤独，仿佛他们身边只有我，再无其他。这人间的孤独，这如今要我记住他们所有人、仿佛他们都抛到我头上的孤独之情，我忍受不了，挣脱开去。等找到我时，我是在图拉以

远的某个火车站，被殴打，被抢劫，过了几个月才被人认出，送回到了莫斯科。

我又多病了半年。我的肾被打坏了，不过不太严重，并且我生病期间一直主管我的医生比我还了解病情，他说我渐渐摆脱发病时，头一次不想恢复，不想回忆任何东西。我对失忆感到疲惫，就想没有记忆下去。他说，以前我身上有无穷的乐观，仿佛一切都不算回事，全是误会，可现在他看到，我的大脑好像对病情已经适应了，学会了利用，对之习惯了，所以现在要治疗我要麻烦得多得多，因为我再也不是他的帮手。还有一点。我明白吃药最终解决不了问题，早早晚晚，即使我不会在哪里被打死，也会变成一个老年病房科的患者，那里远不是世上最招人喜欢的地方。我突然清楚意识到，早就有人吓唬过我，我面临着（而且很快就会有）老年慢性萎缩，因为我的病情主干道就是通向那里。以前这种前景只会让我感到很好玩，《我是老年病中的一员》的题目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玩笑，我自己甚至都喜欢把这拿来说一说。说到底，我只有45岁。

而如今，当我要去住院，事情快到头了，我已经没地儿可钻了，是我自己把自己赶到那儿的。我突然明白了，我一步步地在变成一个对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人。可是还在不久以前，在最后一次发作前，我既不害怕医院，也不害怕彻底依赖于护理员和医生，甚至不害怕死在陷于童年之中的老人中间，害怕的只有失忆。记忆是我的痛处，所以我只怕与之相关的东西。再没有更多更大的东西让我上心。

也许，从一开始发病，也就在最初几次发作之后，我的一生就开始要到头了，开始向后转：我越来越珍视已有的东西，也就是已经经历过了的东西；记忆成了我的世界中心，我失去记忆

哪怕只是短暂瞬间，其可怕程度也极像是死亡。死亡是在过去而不是在将来等待着我，所以我本能地也走向那里，向后，走向过去。这一转向，我的生命中这一对我本人以及我亲近的人来说愈发明显的向后朝向，绝对不是像我起初所害怕的那样，空虚而无意义地重复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另外一端，可是这一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在其中有意义。我几乎立刻发现，有许多东西，非常多的东西，仿佛被我预先地、点状地度过，完完全全没被理解，没被充分估价。而如今这一切都回来了。这当然是个慷慨的礼物，丝毫不少于几年的时间里我一天天从中索取，而其却没有减少，甚至变得更多。所以，看到这一点，我有时甚至对自己的病感到高兴。

我的医生说得对，我适应了，习惯了，总的来说，容忍了，再也不抱怨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期望回到普通生活，身上还有个什么抵抗源，正是在其中萌发出一个思想（也许就能了解我如何挣脱开我的医生灌输给我的东西），那就是我本人不需要记忆，即使其完全不存在（在我一个月以及一个月以上处于失忆状态期间，我了解到了，这样也可以活下去）；但我的记忆应该，主要是我还有力气，保留下只有我了解的那些人，至少是我情愿记住的那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上有许多利他主义的萌芽，让我拾起这一思想（我的责任是把他们所有人牢牢记住，至少也要将其持续我自己一生），它成为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我依然在与疾病对抗。对此起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件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12岁时，5月3日，我命名日那天，我第一次领了圣餐，而在这一我至今都还喜欢详详细细回忆的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偶然听到父亲与他一位朋友谈论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伊凡雷帝的《悼亡受害者名簿》的文章。记得当时这种“名簿”的想法本身，其可能性本身让我震惊。一个人30年毫不心慈手软地杀死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而且明明知道那些人没有丝毫罪过，竟然在垂死的卧榻上开始回想起那些人，还为追悼每个亡灵留下一笔钱。有的人是他自己想起来的，有的人是和他一起杀人的人想起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想起来，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被杀死的那些人也没留下姓名；所以伊凡雷帝明白这一点，留下钱追悼亡灵时如他所写，那些人“上帝啊，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夜里，听完这段谈话，我头脑中产生一个古怪的念头：人可以杀死另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并且完全很简单，只是因为有人该去想起他并让死者复活。我还忽然明白了，死亡就是回归上帝身边，经历了长期艰难考验之后，在意志和责任自由之后回到上帝身边。父亲大约从我7岁开始就喜欢和我谈这些东西，这就好比是从成人生活回到童年，抑或甚至是回到母腹，好像那里可以直接回去一样。并且最重要的是，对上帝来说，没有什么徒劳、白白失去、消失无影踪的，他想的就是要对我们、对人们来说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是从“名簿”中得出来的，但是为什么要在尘世上留下对每个被杀死的人的记忆，为什么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对所有人一律说“上帝，你自己知晓他们”，我不明白，就是现在也不确定明白。当时我只是想到，莫非我们真的全都会留下来，莫非我们真的火烧不掉、水淹不没，也不可能把我们处决、杀死。



我想列入“名簿”的第一人，是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帕斯图霍夫，莫斯科市伏龙芝区前检察官，我和他大约7年前认识的，是旅途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两人当时都在从基辅回莫斯科的路上，一起坐在热得难以忍受的国际车厢双人包厢里，火车照例晚点得无法无天，所以在已经快到莫斯科时，我们因为无聊聊了起来。帕斯图霍夫曾有一个朋友，已经故去多年，生前也是检察官。他们曾一起学习，又一起升职，谁都不比谁先行，用帕斯图霍夫的话来说，他们彼此把对方当作兄弟，年纪越大越亲近。那个检察官姓萨文，二婚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人。

“她的父亲从事商业，受诬陷得到按所犯条款几乎最高的刑期。但是其女儿（名字叫列娜）继续张罗，于是案件在检查监督时落到萨文手里。女孩完全是个英雄，她当时还不满18岁，家里什么钱都没有，全被没收了。稍微知情的律师都表示拒绝，说任何忙都帮不上（她早就没有母亲，母亲生她时死了，一个人和父亲过，如今列娜身边没有任何人了），萨文立刻对她有了

好感。这件事牵扯了一些大人物，帮忙解决并不简单。但是他们两人一起几乎将他捞出来，先是把刑期缩减到5年，又缩减到3年，这样一来就临近最后一次大赦，可就在这一大赦前1个月他死了。女孩被告知是心脏毛病，但是萨文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是同牢殴打死的。

“列娜本来只为父亲而活，只为她理当救回他、找回他而活，如今一切都无所谓了。在萨文彻底拿定主意向列娜求婚那天之前，她两个月没有出门，他像个保姆喂养她，似乎甚至下厨房。除了他，列娜身边在没有人了，萨文也是个独身，一句话，她同意了。他们相识了有一年半左右，列娜已经离不开他了，她大体是个善良、离不开人的女孩；重要的还有一点，从年龄上他如同她的父亲，甚至长相有些相似，这是萨文对我说的，我本人从未见过列娜的父亲。起初她未必爱他，但后来爱了，爱得很厉害，这没有疑问。

“他们过得很好，甚至令人奇怪有多好，所有岁月，除了最后两年。他已经感觉到得了重病，尽管什么病、能活多久还不知道。萨文当然明白，他一定会比她早死很多，但是他突然觉得重要的不是列娜为妻如何，而是一旦他死了，没有他，列娜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怎样活下去。他已经只能这样去想，推开去去想。依我看，让萨文震动的是，他要不了而列娜还在。也许萨文没少想过她会和谁睡，会嫁给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他不打算妨碍她，他觉得重要的只是要知道，没有他列娜会怎样，她在而他不在会怎样。

“后来当他已经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只能活一年，最多一年半时，除了埋葬他后她会怎么办，他别的什么都无法谈。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层次，甚至是自己的死，他也只是把它记作是一个

条件，一个让她离开他单独生活的条件。最后几个月他简直是赶着要结束，坚决拒绝服药，只允许给自己打止痛针。

“妻子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似乎萨文把自己的疯狂传染给了她。至少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列娜也没法谈起别的，时刻都会来说服我，让我相信，相信萨文想要知道她以后会怎样这样做不对，一旦他从那边监视她每一步，这势必让她无法生活，生活难以忍受：如果一个前夫，而且还是个死人，时刻偷窥你，那就没办法生活。

“她也已经把他埋葬，也生活在那个未来生活中，甚至经常说起他也说‘曾经如何’。只有当我去看望萨文，她才想起他还活着，并且立刻开始寻找我的支持。当然，她总是处于激动之中，又从外表上还是表现得很理智；看得出来，她注意每一句话，大体上想要留下一个良好印象。她说，她是他的好妻子，忠实而操心，一次也没背叛过他，尽管他不容易相处，比她大20岁。但是一旦他死了，她把他埋葬了，她对他的义务也就结束了，的确就不该要求以后她也只为他一个人活着。她坚持让我，他最好的朋友，告诉他这一点，和他讲清楚，让他确信是他错了。

“我对她说，萨文快要死了，生命就剩短短几星期了，在垂死的病榻上根本不可能向任何人讲清楚任何东西，现在和他做这样的谈话简直是可耻，他一死，她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列娜已经不太明白事了，她向我讲她要 and 谁睡，谁给她建议了什么，比方说去高加索旅行，那里有皮衣、珠宝，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很漂亮，上帝保佑。有一次她甚至抱住我，吻我的嘴唇，把我拉向沙发，而且当时萨文还没有睡，通往他房间的门没关。我不认为列娜特地把门打开，不认为这是个算计：瞧他还活着，而她当着他面睡他朋友。一切都简单得多，她早就不把萨文当成

个活人，更别说是个男人，而是想收买我，贿赂我，让我做出行动，好让他，一个死人，别妨碍她生活。当然，列娜已经恨他了，但也更像是恨一个死人一样，而他还爱她，依恋她，总是想尽力抓在手中，不放她离开。实际上他不要她任何东西，也许只是想作为父亲（他对列娜来说的确不只是个丈夫，而且代替了父亲的角色）了解一下，没有了他，她那时会怎样。”

火车此时又停了下来，我于是问帕斯图霍夫：“那后来怎么样了？她可是对的，甚至即使不对，你也不能强迫她入他的坟墓啊。”

“是的，”他同意这一点，“萨文死后列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遗嘱。根据遗嘱，她将葬在另一个墓地，在母亲旁边。”

在莫斯科我和帕斯图霍夫继续定期见面，不过不频繁。我看到他离不开我，如果我长时间不打电话不出现，他会生气，特别明显是在他退休后的最后一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对帕斯图霍夫有多大意义。我明白他独身一人，因为在我们的交谈中，除了已故的萨文，没有任何人被提到，可还是不知为什么他坚信自己和同事关系友好。后来有一天早晨帕斯图霍夫90岁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前一天夜里他猝然死去。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我清楚记得她的声音中也存在着不解，她一直不明白，瞧他几乎不生病，比她还小30岁，又退了休，可惜早早死了；也许我转述她的话不准确，当然中间不带有任何讥讽，只有惊奇；我开始说些不太得体的话回答她，她立刻突然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临死前他说起过我，只想起萨文和我，如果只算活人，那就只有我一个。

她还说，帕斯图霍夫想让我做他的遗嘱见证人，她要把他的文件交给我，让我看着办。我当时不相信除了我，帕斯图霍夫再

没有亲近的人，但是葬礼时大家各就其位，我们一共7个人：他母亲，我，他曾就职和上党课的区检察院基层工会的代表，还有那里来的4位实习员来抬棺材。

在头一次“火车交谈”，谈到萨文的妻子后，她名字不止一次在我们见面时浮现。两次也不知是三次，当列娜生活中出现意外并且帕斯图霍夫不知道怎么办时，他来找我商量，于是我和他就会说起她很久；并且除此之外，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到她，这样一来我不难想象萨文死后她的生活是个什么样。比方说，我知道在萨文去世前几天，帕斯图霍夫向他保证不仅要帮助列娜，尽一切让她安置得很好，而且要让萨文掌握她生活的最新动向。帕斯图霍夫还曾当着我的面，定期一周一次去萨文的墓地。

后来，去墓地的探访中止了，或者说至少变得不经常，不是必需的了。我知道他去墓地的时间，并且有一次，当帕斯图霍夫突然把见面固定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后，我问了他。他说已经几个月了，他只在周年忌日和只为自己去萨文墓地，其他没有必要，他答应萨文的一切事情都在他，帕斯图霍夫，之外进行。这次谈话前半年他和我讲，列娜出嫁得很成功，丈夫把她捧在手上。他和他父亲一样是搞商业的，在自己人中间列娜觉得很轻松，很舒适，真的是容光焕发。他许多年没有看到过她如此美丽。很明显，帕斯图霍夫真诚为之高兴，甚至感到负担减轻了，他完成了萨文要安置好列娜那一部分遗嘱。

我们当时说起了商业盛行偷盗，莫斯科已经大搞了一年多对多家最大的食品商店经理的审理，帕斯图霍夫参与了调查，掌握了许多一手细节。他的情绪极端消极，认为不偷不行，否则简直过不下去，但最可怕的是为首的最有能耐，因此一旦把他们抓起来，一切立刻会垮掉。结果毁掉的会比他们所偷的要多得多。